

当代学者人文论丛

张 兵

小说论集

ZHANGBING

XIAOSHUO LUNJI



张 兵 著

这部荟萃着一位学人生命体验的小说论集，由张先生在前些年发表的学术论文的基础上整合精编而成。然而，它绝对不是一部小说研究的『散论』或『杂说』类著作。这里具有侧重明显的体系性，大致可以分成话本小说、文言小说和章回小说研究等系列。其中随处可见创造性的学术发现和个人独到的智慧琼浆。同时还有一条十分鲜明和硬朗的线索贯穿全书，那就是张先生在『代前言』中所阐发的观点：『小说是一种文化。』把小说视为一种文化，并身体力行，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是张先生富有理论气魄和前瞻性的真知灼见，也是聚合这部小说论集的大章法和大格局。

中国文史出版社

张兵小说论集

张 兵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兵小说论集/张兵著. -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5

(当代学者人文论丛. 第6辑/陈星主编)

ISBN 7-5034-1619-X/G·0307

I. 张… II. 张… III. 小说—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4480 号

张兵小说论集

责任编辑:方正 封面设计:福瑞来书装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100811

印 刷: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邮编:101109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26.25

字 数:730 千字

印 数:2000 册

版 次:2005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全套定价:300.00 元(本册定价 48.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当代学者人文论丛总序

张立文

近代以来,西学潮水般地涌进,激烈冲击着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为适应于世界学术文化的发展,中国知识精英们纷纷吸纳西学。这种中西学术文化的交往和碰撞,是促使学术文化转型和发展的动力。罗素说:“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①中西学术文化的交流,使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向现代转变。

中国学术文化在学习、接纳、引进西学的过程中,按西学的学科分门别类,以现在话语说便是与世界学术文化接轨。接轨意蕴着痛苦的冲突和融合:一是要转变传统学术文化的思维方式、立场观点、价值观念、评价标准,以适应西学的需要;二是要肢解传统学术文化的有机整体,选出符合于西学学科名之者的资料而叙述之,不符合于西学学科名之者的资料则抛弃之;三是变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主体的自我发展演化为被动的、受制于人的发展演化;四是要放弃一些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学科范式和学术规范,照着西方学科范式和学术规范讲。在中西学术文化的交流中,有得必有失,有收获也必有牺牲,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但如何得多失少,收多损少,这便大有讲究。主张学术文化“全盘西化”者,“一边倒”学苏联者,则得少失多;学术文化保守主义者、国粹主义者,则失少得少,两者在得少这一点上是共同的。

^① 罗素:《中西文明比较》,胡品清译,《一个自由人的崇拜》,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8页。

在中西学术文化交流中,如何得多失少?应选择融突而和合转生的方式。印度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学术文化,在汉代传入中国后,便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发生冲突,展开了“沙门敬不敬王”、“神灭不灭”、“因果有无报应”、以及“空有”、“夷夏”、“化胡”等辩论。到唐韩愈主张对佛教文化采取“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①的简单拒斥方法,而柳宗元主张“统合儒释”,出入佛道。柳氏在回答韩愈指责他为什么不斥佛时说:“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吾之所取者,与《易》、《论语》合,虽圣人复生,不可得而斥也。”^②柳宗元在当时对待儒、释、道三教的态度:一是以平等、同情的立场和视角看待三教,不扬此薄彼,或尊彼卑此;二是出入儒、释、道三教,才能深入各家学术思想的堂奥,既悉其本真,又知其长短;三是在出入儒、释、道之中,明三教冲突之所在,才能悉三教融合的关键。在这里冲突也是一种融合的方式,所以不能排斥冲突,而应融合冲突;四是吾所取于佛、道者,与《易》、《论语》合。换言之,柳宗元是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出发,以《易》、《论语》为“取”的标准,不是以佛、道为“取”的标准,即取佛、道以合于《易》、《论语》,而不是相反,从而在“统合儒释”中发展中国学术文化。

韩、柳两人对待外来学术文化与本土传统学术文化的立场、态度及其“取”法,对后世宋明学术文化影响巨大。宋初一派以“夷夏”、“费财”之辩拒斥佛教;另一派出入佛道,无论是张载、二程,还是朱熹、陆九渊、王守仁,都累年尽究佛、老之说,而后反求诸《六经》,终于在儒、释、道三教融突中和合转生为新儒学,即宋明理学。学术发展的历史说明,粗暴的批判,取缔的暴力,激烈的拒斥,并不能消除一种思想、学说、理念对于人的思维、心灵的渗透和影响。韩愈主张对佛教采取强制僧侣还俗,焚毁经卷,没收庙产的做法,并没有阻止佛教的继续传播和发展。在唐代,绝大部分第一流知识精英与佛、道有很好的交往,以至相

① 韩愈:《原道》,《韩昌黎集》卷Ⅱ,《国学基本丛书》本。

② 柳宗元:《送僧浩初序》,《柳宗元集》卷25,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73—674页。

信佛、道,出现了一批伟大的宗教家,而没有造就伟大的儒学哲学家。伟大的儒学哲学家应该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统合儒、释、道三教之学者,宋明理学家沿着融合儒、释、道三教道路,出入佛老,反诸《四书》,和合转生,而开出理学的新学风、新思维、新理论。

在当今中、西、马学术文化交流互动的情境下,学术界在改革开放以后清算了极左思潮,开创了学术的春天,营造了生动活泼、求真务实的学术环境,提倡说理充分的批评与反批评,鼓励大胆探索,主张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既不要把学术探讨中出现的问题当作政治问题,也不要把政治倾向性问题当作一般学术问题,明确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为学术研究和讨论松了绑。在这种学术的氛围中,中、西、马学术文化的冲突、融合,而喷发出智慧之光,中华学术文化在吸纳西、马学术文化中,和合转生为新的学术文化;西、马学术文化在中国化过程中,成为中国化的西、马学术文化。中、西、马学术文化融突和合,生生不息。

无论是中华学术文化的和合转生,还是西、马学术文化的中国化,都应从创新出发,立足于创新,落实于创新,创新是学术文化发展的硬道理。我们“要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我们要“立足当代又继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立足本国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我们要“努力建设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积极推动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科研方法创新”。这里所说的“三个解放”,就为中华学术文化的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科研方法创新的“三个创新”,营造了前所未有的创新机遇和优越氛围。我们应该有下地狱的精神和盗天火的勇气来实现中华学术的这“三个创新”,建构中华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

《当代学者人文论丛》便是从这“三个创新”契入,回应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种种冲突和危机。他们各自从教育学、中西哲学、文学、历史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伦理学、管理学、心理学、逻辑学、新闻学、语言

学、科学等多视角、多层面探索问题。并以强烈的问题意识,接触各种学术文化中的深层问题,提出种种化解之道。既有对中华民族学术文化的继承和新诠释,又有对西方学术文化的吸收和新诠释。在融突“古今中西”学术文化中,尊重知识,尊重人品,尊重人才,尊重创新,提倡不同学术观点、学术流派的争鸣和切磋,那末实现“三个创新”的目标一定能够达到。

是为序。

2004.4.6

于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

在我看来，小说并不单纯是一种文学文体，而是人类整个精神宇宙的载体之一。它可以创造文化乃至世界，也创造了我。我通过小说找到了生命的意义，精彩的人生由此也展现出它的华丽乐章；小说也因我而凸现其固有的律动，变得生机勃勃，充满精灵和神气。此时此刻，我走来了，拥抱着小说，走进这缤纷四射的艺术世界，忘情地吮吸着它的智慧琼浆。……这里留下的点点滴滴，是我生命历程中的一束束火花，但愿它能为后来者带来前进道路上的光明。

——作者手记

谨以此书献给一切
关爱过我的亲爱的师友
和同事们，也献给长期
支持我投身学术的亲人们。

目 录

序一	陈建华(1)
序二	李桂奎(6)
代前言:小说,一种文化	张 兵(14)

(上)话本编

第一章 话本论	(31)
一、话本小说再评价	(31)
二、话本小说的美学特征	(43)
三、话本小说艺术初探	(52)
四、论话本小说中“女助男”的母题	(61)
五、《京本通俗小说》的证伪及其意义	(72)
[附]《京本通俗小说》所辑录的小说	(84)
六、谈《熊龙峰刊行小说四种》	(92)
七、我喜爱“三言”	(99)
[附]“三言”名篇欣赏	(113)
八、“两拍”名篇论	(138)
[附]《型世言》:话本小说的又一重要发现	(159)
九、《照世杯》初探	(161)
[附]《照世杯》名篇欣赏	(170)
十、《雨花香》浅识	(177)

十一、话本名作之我见	(188)
(一)《连城璧》第一、二回	(188)
(二)幻中真	(194)
(三)金兰筏	(201)
(四)娱目醒心编	(207)
第二章 话本史论	(214)
一、话本小说史的分期问题	(214)
二、“说话”溯源	(232)
三、话本的定义及其他	(252)
四、“准话本”刍议	(263)
五、拟话本三题	(271)
六、唐代的“说话”和话本	(284)
[附]一条唐“话本”资料的探考	(303)
七、北宋的“说话”和话本	(307)
八、南宋的“讲史”和“说经”话本	(321)
九、南宋的“说铁骑儿”话本和《宣和遗事》	(331)
十、元代的“说话”和小说话本	(345)
第三章 话本学史论	(354)
一、“五四”以来话本小说的研究	(354)
二、新时期话本小说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365)
(下) 小说编	
第四章 综论	(379)
一、明清小说艺术发展概述	
——为《500种明清小说博览》而作	(379)

二、从《赵泰》看佛教对中国小说发展的意义	(428)
三、略论明清小说中的人物类型化问题	(446)
四、丁耀亢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467)
第五章 武侠论	(478)
一、武侠小说发端于何时?	(478)
二、武侠小说的文化特征	(498)
三、武侠小说的艺术审美价值	(521)
四、武侠小说为何走俏市场?	(529)
五、我对金庸小说“经典化”及其成因的意见	(542)
第六章 名著论	(551)
一、“扬州八怪”的绘画美学思想与曹雪芹的艺术思想	(551)
二、《红楼梦》对比手法初探	(562)
三、儿女笔墨 社会大观 ——《红楼梦》和《傲慢与偏见》的比较研究	(572)
四、谈《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	(583)
[附]“红学”新革命	(587)
五、论《金瓶梅》研究中的“封建说”	(592)
六、《金瓶梅词话》的“人欲”描写及其评价	(610)
七、《金瓶梅说》选编者言	(625)
八、《金瓶梅》研究综述	(630)
九、寻找罗贯中	(639)
十、真幻结合的献身理想者之歌	(648)
十一、试论《儒林外史》第一回	(657)
十二、《铸剑》的文化解读	(661)
[附]越文化特征新论	(680)

第七章 文言和文献论	(699)
一、“传奇”的由来和发展	(699)
二、瞿佑及其《剪灯新话》	(703)
三、着人先鞭的力作	
——读陈益源先生的《元明中篇传奇小说研究》	(725)
四、校点整理古代小说的“前言”两种	(736)
(一)《新上海》	(736)
(二)《古本乾隆外传》	(738)
[附录]一 类型描写与小说史叙写	
——从《宋辽金元小说史》说开去 ... 叶 辉 杨 彬	(741)
[附录]二 一部别开生面的转型期小说史	
——读张兵先生《宋辽金元小说史》	
..... 许建平 孙 明	(754)
[附录]三 甘把金针度与人	
——评张兵《宋辽金元小说史》	聂付生(760)
[附录]四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张兵先生学术访谈录	张 兵 聂付生(763)
[附录]五 探索者的足迹	
——读《张兵小说论集》	李乐平(778)
[附录]六 致友人:生命中因您更精彩	
——我的小说研究之路	(786)
[附录]七 张兵简历和主要论著及论文目录	(810)
后记	(820)

序 一

陈建华

去年十一月，香港正当金秋阑珊，与张兵聚于九龙塘“又一栈”，其实没喝多酒，一两罐啤酒，话却没少说。走在街上，秋风也没见凉意。我们相顾莞尔，突然发现我们是同年生，眼下已到了羞称中年的时候，回想君子之交，过隙二十余年，许多事好像还是在昨天一样。街上灯红酒绿，人照常那么多，还不愿马上就散。他一定要去我的住处看看，于是乘地铁、搭小巴，来到我的科大校舍。屋里乱而脏，不知会给他什么印象，窗外一团黑，可惜了一片海景。但张兵对我的盛意，犹如丰草长林，久久留着。

如果在我的生活里有一种学术生涯的话，那末在踏上这条道儿时，得到众多师友的倾情扶持，其中也难忘张兵的一把搀扶。1984年，我在复旦分校（即今上海大学）教书，写了一篇有关杨维祯的戏曲实践的论文，投给《复旦学报》，不久就发表了。当然，每当看到自己的东西被发表，总是喜欢的，但那种牛犊初生的兴奋，就很难忘，重要的是由此带来的那种自信，我想对于有志学术的，难得的是初出道的那份幸运感。尽管如此，那时我不知道文章是在张兵的手里发的。不久，我回到复旦读博士课程，就认识了他。此后在《复旦学报》上发表的论文就多了，即使我在国外，有什么文章寄给他，仍然照发，就像我还在复旦一样。只是这几年自知学报的版面越来越紧，就不好意思给他寄了。有一回他跟我说，他喜欢我写的文章，学术论文写得有文采、有灵气。这或许能解释他一向对我青睐有加的理由，我却觉得特受用，人往往是这样，

真实或正确与否还在其次,因为我自己不这么意识到,也很少听到有人这么说,更何况这么说的是张兵。

这些年来,我心目中的张兵,活得越年青而精彩了。那是在1989年,我回上海见到了他,故乡遇故知,一晃十年过去了,岁月的印痕刻在各自的脸上,他变得胖了,但张兵还是张兵,永远的忠厚。那次回家,一切都令我惊奇,跟上海一样,每个人都在写自己的传奇,张兵也是。他告诉我他送儿子去日本读书,也买了房,并邀我去了他的新居。但远比惊奇来得持久的,是一种感动,他送了我一大叠书,有写的、编的、译的。其实他不光在做学报编辑,也一直在教书、作研究,没想到这么用功,且卓有建树。

近两年我在香港教书,回沪多些,和张兵相聚的机会也多些,每次总有新著送我,现在手头上少说也有十多本。像《宋辽金元小说史》那样的著作,明显是吃功夫的。其实功夫都来得不易,就我所知道的,他一向对小说情有独钟,很早就专注于话本研究,记得在80年代末他编过一本话本小说辞典,我也参加写过《清平山堂话本》的几个条目。20年来为他开垦的小说领地浩瀚无垠,且耕耘得仔细,即使像他校点的“三言”,我觉得也是最全最好的,至今用来作我的教材。

张兵成了我心目中的楷模。他的可观成绩令我鼓舞,不懈追求令我感动,在这背后应当有什么不寻常的动力吧,我不禁好奇的想。

“小说是一种文化”,张兵说。读了他的论述,受启迪之余,浮想联翩,也明白他何以能对于小说研究投入如此持久的热情,部分满足了我好奇的追问。

小说是一种文化,首先是民族精神的体现,这对我们并不陌生,但我觉得特别可贵的是张兵所具的那种平常心,也就是他所理解的民族精神集中体现在普通人身上。这涉及什么是小说的认识,其中含有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反思,意味着小说研究中某种研究范式的转型。所谓“民族精神”的提法,不得不追溯到上一世纪初梁启超倡导的“小说界革命”,即要求小说表现“民族魂”,这没有什么不好,但他指斥《水浒传》、《红楼梦》为“海盗”、“海淫”,同时例举华盛顿、拿破仑等作为小说

理想的“英雄”人物。事实上梁氏还说了一些别的东西,但他把小说变成“大说”的倾向在 20 世纪中国如洪钟巨磬,激起阵阵回响。到后来,越是国难当头,小说就越被要求担当起救国的大业,结果形成了“革命”的“正典”的生成,即以是否塑造了“高大全”的英雄人物作为衡量作品好坏的标准。其影响所及不仅在创作领域,而在古典小说的批评中,也就没有什么值得肯定的东西。可喜的是新时期以来已出现研究范式的转型,一个重要标志如章培恒先生所提倡的以“人性”为基础的批评标准,而张兵所崇尚的小说的民族精神,也正是将人性作为衡量标准的。

“文化”的意义很难界定。经过一番中外名家概念的爬梳,张兵指出文化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的复杂机体。我是完全同意这样的“众声喧哗”的文化定义的,其实这是更合乎小说的,照巴赫汀的经典论述,小说本来就是一种“众声喧哗”的文体。中国传统的文化定义,一向偏重思想概念的层面,直到 80 年代兴起的“文化热”,仍未摆脱精英、高调的文化观念。因此像张兵所主张的文化意向,虽然应用于小说研究方面,却反映了当下全球化时代在文化上要求多元的潮流。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出现的一股新潮是文学史研究朝“文化研究”靠拢,我自己在教学和研究中也着力于如何把文学史和文化史结合起来。我觉得探索文学的意义,应当尽力回到丰富复杂的历史脉络,同时运用各种理论资源,除了“文化研究”所关注的种族、阶级、性别的课题,还可以诉诸宗教、美学、视像、身体、情色、空间等视角。

近年来,就我所注意到的,文学研究和思想史结合蔚成风气,如宋代文学与儒学、晚明文学与心学等,不消说在现当代文学方面更和文化批评的关系愈为密切。在古典小说研究和思想史观照方面,我想起浦安迪教授的关于明代“四大奇书”的宏伟诠释,已为学界熟知。这部在北美汉学界的先锋性的著作,某种意义上却是一粒迟开的果子。更早开风气的应当是在上世纪 50 年代见世的伊安·瓦特的《小说的兴起》一书,尤其是此书将 18 世纪以来英国小说中的主人公放在当时个人主义的哲学脉络中加以考察,使我们对小说作为类型及其形成的理解更上层楼。同样浦安迪灼见地指出晚明小说的“文人化”特征,使我更觉

兴味的倒是他对小说形成如“反讽”、“意象”或“修辞”方面的诠释。尤其是对《金瓶梅词话》，充分体会并提升了张竹坡的评点，精见叠出。不过，把文学史和思想史相结合还是不够的。浦教授对晚明思想氛围的理解，既受惠于70年以来在北美蓬勃兴起的“新儒家”论述，同时也无可避免的受到了它的局限。或许更重要的是他的论述触及许多层面，如版本、书商、市场、读者、小说评点、著作权及经典化过程等，都牵涉到晚明文学和文化的近代变迁，而问题还有待提出和解决，也必得结合文化研究方能奏捷。

把文学史同思想史、文化史结合起来，能给文本的意义带来新的空间，但也会产生新的问题，即忽视文学自身的特性，使文学被思想或文化吃掉。尤其是当下全球化现代性正长驱直入而所向无敌、给地域文化和个人自由造成新的威胁之时，有必要强调文学的自我和艺术创造的自主性，作为某种抵御——尽管是微弱的——方式，在这一点上我也完全赞同张兵对文化作为“多种符号形式存在”的认知。像诗歌等文类一样，小说符号媒介也是语言，一般认为诗是一种更为精致的语言艺术，就比较容易忽视小说符号系统的复杂性。在现时欧美大学里，对于读文学的研究生来说，巴赫汀和韦恩·布斯的小説理论是必读的，如何分析“叙述者”及其“口吻”、“观点”是一种基本训练。然而我们读小说习惯上不重视作者和叙述者之间的区分。去年在我的晚清小说讨论班上，对于《文明小史》中写到讥刺康、梁的地方，就认为李伯元在表达对改良派的不满。这是怪不得同学的，因为他们也是参考了某些专家的说法。其实与其他一些晚清小说一样，《文明小史》作为“小说界革命”的产物，与梁启超的“新民”、“群治”等民族国家的现代性想象有密切关系。但这样简单地把李伯元和叙述者划上等号，就只能停留在鲁迅的“讽刺小说”的论断上，而难以对其叙述主体和小说形式的历史开展等问题作深入的探讨。

讨论班上反映的问题是有普遍性的，使我觉得迄今为止我们讲文学，基本上还是以内容主题阅读为鹄的，在运用“符号学”、“叙述学”文学分析文本方面还未形成风气，更遑论重视文本所蕴含的中国自身的语言意识了。同样的在小说研究方面，虽然巴赫汀和布斯的小説理论